

二十年代小说中的侠意象与侠义精神评述*

李 欧¹, 傅其林²

(1.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2. 四川大学 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 武侠小说的传统、晚清志士的心态和行为、特定的时代氛围, 使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小说弥漫着侠意象和侠义精神。不仅是武侠小说本身, 更在于非武侠小说的通俗小说和新小说亦是如此。当然, 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作了现代性的转换, 并且呈现出互动的态势。

[关键词] 二十年代小说; 侠意象和侠义精神; 现代性转换; 互动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7)03-0120-05

二十年代的小说的侠意象和侠义精神与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秋瑾等革命人士, 均持有任侠心态、复仇意识, 以之来弥补弱国病夫的弊端, 对抗西方的坚船利炮, 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而且, 他们的武侠观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如谭嗣同认为: “任侠, 亦足以伸民元, 倡勇敢之风。”^{[1](p.543)} 梁启超说: “尚武者国民之元气, 国家所恃以成立, 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2](p.108)} 晚清志士关于尚武、尚流血、尚任侠的论述极为盛行^[3], 不可胜举。他们倡导的这一思想潮流以及他们本身的侠义行为, 如谭嗣同、秋瑾等, 直接影响到后来小说中的武侠观念。

二十年代的小说中的武侠观念既延续着古老的复仇侠义精神以及晚清志士的武侠观念, 同时又发生了新的嬗变, 开始具备现代性特质。可从两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是武侠小说, 一是非武侠小说, 尤其是新小说。

二十年代的武侠小说创作风起云涌, 虽然其武侠模式仍接近于传统, 但优秀者却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体现出时代的特色。大多

主张通过发扬侠义精神来利国利民, 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 并注重武的本身的学理研究。平江不肖生从小习武, 对武术有研究, 在日本终日和“日本柔术家、剑术家、射箭师来往。”^[4] 回国后, 对沪上名流、帮会头目、武林高手、各路好汉, 无不交往甚密, 并在湖南建有国术馆, 提倡尚武精神, 强调人之身躯与意志的统一。在小说创作时, 他讲求实录, 不向壁虚构。其代表作之一《江湖奇侠传》承续《三遂平妖传》、《济公传》的剑侠、神怪传统, 以湖南省平江、浏阳两县居民争地械斗为经, 以昆仑、崆峒两派剑侠分头参与助拳为纬, 带出生动有趣的奇特情节。但作者认为这些情节仍然是实有的, 他说: “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 奇奇怪怪的人物的确是有的, 不是作者向壁虚构在捣鬼。”可见, 他创作小说意图受到当时写实潮流的影响。尽管小说中一些人物的武功神奇诡迷, 但侠客的精神是同情弱者, 寻求正义。如智远和尚对于捉弄划排人的富家子弟, 虽有不满, 但见他中了致命的七星针, 便设法相救。实际上突破了善恶对峙的武侠观念。其另一代表作《近代侠义英雄传》的时代特色更为明显, 作者自

* [收稿日期] 2007-02-18

[作者简介] 李欧(1954—), 男, 四川南充人,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美学、艺术理论、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傅其林(1973—), 男, 四川岳池人, 文学博士, 四川大学中文系, 副教授, 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

云:“这部书为近代二十年来侠义英雄写照。”该小说处处不离民族精神,侠烈气概。霍元甲面对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辱骂,义愤填膺,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意识、民族意识。并且还有更开阔的心胸,并非宥于狭窄封闭的视野。他说:“兄弟并不排斥外国人,蓄意与外国人作对,只因曾听得许多人谈论,说外国人瞧不起我们中国人,讥诮中国人是病夫,觉得这口恶气忍受不下去,哪怕就拼了我这条性命,也要使外国人知道,他们拿病夫来形容中国人是错了。除此而外,排斥外国人的心思一点儿也没有。”可见,这种武侠观念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其理想观念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改变了传统的清官侠客的模式,有着强国强种的时代特色。故叶洪生总结其特色是“强调民族气节,表彰侠烈精神,而以‘东亚病夫’为憾为耻,令人读来虎虎有生气,奋然思以强身、强种、强国。……清末之中国动乱频仍,新旧思想对立;而作者独能观察入微并反映出当时‘排外’、‘媚外’种种人心向背实况。这不仅是小说家言,而可视为社会史家之论了。”^{[5](p.26)}正是这种取材与创作态度,该小说的侠客形象现实化,社会化,时代化了。

浙江鄞县的姜侠魂也注重国术研究,所著《江湖廿四侠》(1928)也传达了以侠报国的爱国情怀,他在出版宣言中说:“侠魂不敏,鉴于吾国国势民情日就荏弱,曾于民国初年,以文艺之力鼓吹武侠,冀化精神教育之辅助。”顾明道也是二十年代的重要武侠作家,他谈到创作动机时,依然强调“壮国人之气”。代表作《荒江女侠》后半部主要写“琴剑”帮助爱国志士反抗清朝统治者,具有进步思想。姚民哀被誉为帮会武侠之祖。他从9岁起浪迹江湖,对秘密帮会很有了解,其《山东响马传》中的人物亦是为国奋斗的复仇的志士。他在自序中说:“因见彼辈见义勇为,同党相患难,志坚金石,心慕焉……会感于临城劫车巨案之发生,牵涉外交,丧权辱国。”于是作者创作了该小说。不难看出,作者与小说侠客都注重爱国,为爱国而复仇,行侠仗义。其《四海群龙记》的思想更先进,小说写到一个“三不社”,主张不为官,不为盗,不狎邪,甚至主张带有革命色彩之无产阶级,应与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开始战斗。这已经表现出了新时代的革命斗争精神。

其次,非武侠的通俗小说也密集地出现了侠意象,渲染着侠义精神。例如张恨水,他的小说中的

武侠观念更具现代性,已经体现出侠义与人道主义的相融的态势。他善于表现现代青年中的侠义观念。如《金粉世家》中的杨杏园、李冬青,他们为人正直,洁身自好,在丑陋的社会中,对困厄之人慷慨解囊,急公好义,其侠义观念与20年代富有强烈的独立意识的青年结合起来。《啼笑姻缘》中的关秀姑、关秀峰很有侠义情怀,他们讲求信用,救人于厄难之中,体现出高贵的品质,并且他们都是义勇军的领导人物。他们的侠义复仇思想通过军人沈国英对秀姑的评价得到了彰显:“只是我沈国英好惭愧!我当军人做到师长以上,并没挂过一回彩,倒不如关女士挂了彩又挂彩,不愧军人本色。关女士深闺弱女,却能舍生忘死,替国家去争人格,难道我就不能为国出来吗?”小说中关秀姑那公私分明、大义凛然、敢于牺牲的精神,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与复仇的心态融为了一体,体现了侠义模式的独特的现代品格。

现代侦探小说的翻译与创作,也促进了传统侠义模式的变化。二十年代的侦探小说中的侦探,常常是一个伸张正义,救人于厄,惩治罪恶的“平不平”的侠客形象。其侠义模式的现代性特征体现为主张人人平等,互不侵犯,以及强烈的法律意识。而法律是死的,一旦依法不能维护正义时,侦探就会为后者而不惜牺牲法律。所以,程小青创作的“东方福尔摩斯”系列小说《霍桑探案》中的霍桑与包朗认为:“在正义的范围之下,我们并不受呆板的法律的拘束。有时遇到那些因公义而犯罪的人,我们往往自由处置。法制精神既然还不能普遍实施,细弱平民受冤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我们不得不本着良心权宜行事。”(《白衣怪》)侠义精神与法律意识相融一体,也体现出侦探小说的一些中国本色。孙了红的侦探小说把复仇意识与侠义观念,侦探与盗,同对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如《燕尾须》中的鲁平,既充满的复仇与侠义精神,又对庸才警察进行玩弄,表现出侠义模式的时代特色。

新小说的主将一般是鄙视、排斥武侠小说的,将其斥之为“旧”、“落后”。但是,特定的时代思潮,以及文化传统的濡染,他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塑造了一些侠意象。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小说中,其正面主人公或多或少地具有侠义精神。当然,其观念与同时代的武侠小说相比,已有较大的差异。面对黑暗现实,不仅是“平不平”和复仇,更是努力去

为光明、自由而战斗。

鲁迅的侠义情结已为许多学者所论及。他的侠义思想首先来源于墨家,“对于秦以前的侠,鲁迅认为是出于墨家,墨子之徒为侠,墨子提倡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相传墨子及其门徒都能赴汤蹈火,以自苦为极。鲁迅肯定了这样的侠。”^[6]而且,他的人生经历,他对“国民性”地思考,他的英雄情怀,使他对古代侠义中的“复仇”观大有兴趣,如他的壮语“会稽乃复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面对恶的现实,鲁迅的侠义英雄情结在其不少小说中都有体现。

《铸剑》较为明显地体现了鲁迅的侠义情怀。其情节是源于干将为楚王铸雌雄剑而延时,私藏雄剑被楚王发觉,从而被杀的故事。鲁迅在传统侠义观念的基础上作了新的思考,既承续古代,又超越古代。其典型意义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颂扬行侠仗义,救人于厄的侠义精神。眉间尺为报杀父之仇舍生忘死。宴子敖见他处之于厄,不顾己之得失,两肋插刀,为之复仇。这表现出作者对真正侠义精神的推崇,同时也表现了对“伪侠”的批判。小说中,宴子敖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这是对真正而纯粹的大侠精神的弘扬。当仗义、同情作为放债的资本而有所企图时,侠客的精神便变了质,如《明天》中凭点侠气来占妇女便宜的阿五,这种侠当然要受抨击。但是,那种仗义行侠,不顾自身之得失,视他人之难为自己之难的真侠精神,如宴之敖、眉间尺的侠义复仇精神,鲁迅是高度赞扬的。另一方面是鲁迅这篇小说所张扬的强烈的复仇精神与当时作者对血腥的现实的抗争结合了起来,有着鲜明的现实性。作者在小说完成后的第五天的演讲中说到:“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7]通过革命去对现实社会中的屠杀者复仇,既承续了以暴抗暴的古代复仇精髓,又集聚了时代的正义心理特定指向,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郁达夫、郭沫若等二十年代的小说中也充满了侠义主题模式的因素。身体羸弱、性格羞怯的郁达夫对侠义人物是崇拜的。他心目中的英雄侠客是自由的,勇猛的,他羡慕农家子弟阿千“日日去上茶

店酒馆,婚丧的人家,也老在进出;打起架吵起嘴来,尤其勇猛”。^[8]郁达夫《沉沦》中的“他”处于被歧视的弱国子民的地位,复仇意识是十分突出的,如“狗才!俗物!你们都敢来欺侮我么?复仇复仇,我总要复你们的仇。”郭沫若的侠义精神更为明显。他从小好打抱不平,敢于为公益事业挺身而出,不怕牺牲,敢于坚持正义。他19岁时还在乡“倡办民团,创立观字营,保卫乡里。”^[9]又喜读《水浒》,还把《史记·刺客列传》列为“最喜欢读的辞章。”^[10](p.14)1925年他赞颂王阳明的“任侠气概是他激世精神的根株,他的骑射、文章是他武功、学业的工具”。^[11]可见,其侠义品格既重勇武,又重精神。在不平的时代面前,他的这种侠义精神逐渐强化,他说:“我赞美游侠,赞美朱家郭解。天下的人假如都是游侠,都是急人危难不顾自己的自家性命的朱家郭解,世间上那么会有不合理的权势存在?”^[12]可见郭沫若对侠义精神是十分推崇的。尤其可贵的是,在他身处不合理的世道,处处有人之难,国之困的境况中,他在努力张扬并实践其侠义观念,主要有二条途径:一是从事政治斗争,以革命来行侠仗义、维护正义;另一方面,以笔为刀枪,在审美艺术中宣泄与满足其游侠情结,创作了大量彰显侠义精神的人物形象。其不少小说有明显的侠义主题模式的特色。早期创作的《牧羊哀话》就通过描述朝鲜李朝政治斗争,塑造了一个英毅勇敢的石子英,该小说被认为是带有“初经起步的中国现代小说所罕见的英雄传奇的气质”。^[13](p.580)侠义精神比较明显。1924年创作的《歧路》叙写主人公的“他”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送走妻子儿女,单身留在上海挣钱。他不愿与社会合污,宁可饿死,发誓不行医,并说:“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因为做强盗的人还有良好的一面,只抢有钱人。小说表现了受欺压的人对社会复仇的强烈愿望,只不过其侠义精神不是纯粹的,还带有“盗”的痕迹。郭沫若小说表现的复仇精神已由传统的对单个个体的复仇演变成对社会的复仇,是为弱者鸣不平的更为高尚、更为现代的复仇反抗精神。实际上,郭沫若在小说中表现的复仇意识已经改变了传统复仇观念的狭窄性,更注重在精神层面的反抗束缚,张扬个体自由,寻找社会平等的思想,其复仇观念已经与时代思潮融为一体。

蒋光慈的复仇模式与郭沫若的有些类似,只不

过政治斗争性表现地更为激进。《少年漂泊者》中的汪中在父母被地主逼死后,四处流浪,后在东征陈炯明之战役中英勇牺牲。汪中有侠义观念,在万恶的社会中,他佩服劫富济贫的土匪,为了自由去对抗黑暗,被学界称为典型的拜伦式英雄。这也是蒋光慈追慕千古侠魂的投射。蒋光慈,自号侠生(或侠僧),从小追慕朱家、郭解等豪侠之士,有着打抱不平,扶助弱者的铮铮侠骨。他说:“我曾忆起幼时爱读游侠的事迹,那时我的小心灵早就种下不平的种子,到如今……我依然如昔,我还是生活在不平的空气里!……我不过是一个粗暴的歌者。”^[14]他的侠义观念与其处的时代融为一体,以革命去行侠仗义。《鸭绿江上》中的孟汉为爱人为祖国而斗争献身。《短裤党》中的李金贵率领工人纠察队攻打警察署时壮丽殉难,其妻邢翠英闻讯后,满腔复仇怒火,持菜刀冲入警署,砍死两个警察,最后死于弹雨之中。小说激烈的复仇行为既为“小我”,又为“大我”。此外,《野祭》中作者追慕的怀有侠魂的女战士章淑君,《最后的微笑》中复仇者王阿贵,《冲出云围的月亮》打倒土豪劣绅的集体性的复仇者等等,他们都表现出鲜明而强烈的侠义复仇精神与行为。蒋光慈把古代侠客、拜伦式英雄与社会新思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暴力观念)、中国革命融为一体,一种古老的复仇侠义模式在现代人思想与行为中凸现了出来,虽古尤新。

此外,二十年代小说中,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沈从文的《龙朱》等都有着复仇侠义观念。除小说作品外,同期的许多新文学作家都程度不一地张扬着侠义精神。蔡元培说:“人之于人,无所不爱。见有弱于我者,辄感天然之不平,而领以人力平之。损有余以益不足,此爱护弱者之原理也。”^{[15](p.196)}他把行侠仗义,打不平视为人之基本道义。女作家冰心也崇拜横空出世的英雄,并把英雄与悲剧并举:“你如果做了悲剧中的主人翁,不要以为不幸,要知道悲剧是英雄的所有物,小人物只能成为惨剧,因为他们没有强的自由意志。”并说:“中国只需悲剧,我们所要的乃是悲剧,如同项羽岳飞,这都是悲剧的材料。”^{[16](p.122)}成仿吾也注重勇气和复仇意识,他说:“对于时代的虚伪与它的罪孽,我们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我们要是真与善的勇士……打破这现状是新文学家的天职。”^[17]他还通过挖掘传统的士气

来对抗与颠覆现实社会制度。沈从文也提倡侠义精神:尤其挖掘湘西人的侠义品格:“慷慨好义,负气任侠,楚人中这类古典的热忱,若在当地人寻觅无着时,还可以从这两个地方的男子中发现。”^{[18](p.237)}实际上,不论从创作上,还是从思想方面,行动方面,二十年代的侠义精神潮流是十分鲜明的,只不过有着对抗罪恶社会、反动势力、束缚人的传统制度与习俗的鲜明时代性。因为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不满,反抗,斗争意识很容易通过武侠这种特殊形式的诱发而宣泄出来。武侠讴歌的反抗与不屈之精神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与当时的革命精神品格有较大的内在契合点。

可见,通俗小说与新小说中都有着侠义主题模式,他们都承续着古代以暴抗暴的复仇观念和行侠仗义的精神品格,都在二十年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呈现出或多或少的变化。如果说通俗小说是在壮国人之气中表现鲜明的爱国爱民,救助弱者的意识;而新小说则更表现在对社会、人生的更为宽泛的侠义观念,与时代的新潮流,即“革命”意识结合得更紧密,与主体尚个性主义的自由观念结合得更密切。因此新小说的侠义观念更富于现代性。通俗小说在立足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同时,参照新时代的思潮,不断地在调整自身,并通过其对社会人生的独特体验,对传统思想的审视与反思,开始意识到传统的一些思想的弊端,并参照传统思想,对新文化思潮进行不断的理性辨认,接纳了新小说思潮的积极有益的因素,批判了其过激的主张。新小说多接受了国外现代思潮,信奉民主、平等、自由、革命等观念,但他们或多或少地承续着中国的传统精神,一旦现代精神与传统精神相契合,传统精神的积极意义便凸显了出来。新小说借鉴了表现传统精神的通俗小说的一些固有模式;这并不意味新小说有复旧倾向,而是思想总是在反思中丰富,在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突进。一味的旧,一味的新的,都只能导致人类思想观念的萎缩。某种意义上讲,二十年代雅俗小说侠义主题模式的互动为人们传统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反思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参照系统。

[参考文献]

- [1]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全集[C].第三册.

- [3]陈平原.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4]向恺然.自传.江湖奇侠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 [5](台)叶洪生.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 [6]周蕊秀.瞿秋白鲁迅论侠文化[J].鲁迅研究月刊,1995,(4).
- [7]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8]郁达夫.我的梦,我的青春——自传之二[J].人世间,1934,(18).
- [9]张静庐.郭沫若五十年简谱[M].
- [10]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M].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 [11]郭沫若.王阳明礼赞.郭沫若全集·历史编[C].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2]郭沫若.豕蹄·司马迁发烧[Z].
- [1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14]蒋光慈.鸭绿江上·自序诗[Z].
- [15]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A].蔡元培先生全集[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 [16]冰心.冰心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 [17]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J].创造周报,1923,(2).
- [18]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朱德东)

Review of the chivalrous image and chivalrous spirit in the novels of the 1920s

LI Ou¹, FU Qi—lin²

(1. School of Art,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Sichuan Chengdu 610041, China;

2. Chinese 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 The China's novels of the 1920s are full of chivalrous images and chivalrous spirit because of the tradition of chivalrous novel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s of noble-minded patriots at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specific atmosphere at that time. Not only chivalrous novels are so but also so are common novels and new novels. Of course, these novels mad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t different degree and showed the trends of interaction.

Keywords: novels of the 1920s; chivalrous image and chivalrous spirit;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teraction